

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 1937-1975*

劉曉鵬**

摘 要

本文試圖從人才運用的角度，呈現過去常被稱為國民黨智庫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另外一面，尤其著重該單位於1975年改隸國立政治大學之前的歷史。透過比較其前身——國民黨於抗戰時期成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作者強調該智庫的出現是由於國家出現危機，而於現有情報架構外迅速成立的專業對敵分析單位。除了透過蒐集情報與研究敵人政經制度以協助國家領袖研判情勢外，該單位也具有宣傳與養士的功能。這種架構並非常態性政府組織，其存在容易受政治影響，故其缺陷在危機消失後也逐漸顯現出來。

關鍵詞：智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芃生、蔣介石、蔣經國

* 作者除感謝審查人、複閱人與校稿人的寶貴意見，也在此對逝世的方雪純老師、接受訪談的汪琪（汪公紀先生女公子）、李弘謙（李直夫將軍公子）、李本京、邵玉銘、陳鴻瑜、陳明、張虎、張旭成、蘇起等教授，及協助調閱檔案的丁樹範主任與陳至潔教授，敬申謝忱。特別要謝謝我的父親劉若鐸先生，他對1940年代的回憶與文獻掌握，是撰寫本文動力的來源。

收稿日期：2013年3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年7月10日。

**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助理教授

前言：智庫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研究智庫的知名學者戴安史東(Diane Stone)於早期的作品中，曾認為智庫是超越黨派、政府與利益團體的機構，¹但幾年之後她改變看法，改稱智庫乃提供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等政策研究與建議的非營利機構。²戴安史東對於智庫定義的改變，剛好顯示雖然智庫不營利也提供政策建議，但與黨派及政府的利益密不可分。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關中心」）過去即常被稱為是國民黨的智庫，該單位主任鄭端耀於 2010 年有以下說明：

〔國關中心〕大概也可以算是台灣最具有歷史悠久性的（研究機構）。當初成立的目的其實非常簡單，就是要做為一個政府的智庫……政府需要有一個研究機構，能夠對大陸事務、國際的問題來提供意見以及給政府做為參考……國民黨一黨主政這麼多年，我們當時做為一個政府的智庫，我們自然是在幫國民黨做事。³

雖然正式學術文章少有專門討論國關中心的政黨傾向，但除了鄭端耀對該中心歷史的描述，非學術文章也指其為國民黨人才庫。⁴對於這樣的評價，也有文章以實證經驗強調該中心是為政府服務，從未替一人或一黨營私。⁵

¹ Diane Sto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6.

² Diane Stone,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nalysis," in Frank Fischer, Gerald J. Miller, and Mara S. Sidney, eds.,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 Theory, Politics, and Methods*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 2006), pp. 149-157.

³ 吳宗翰，〈台灣智庫機構之分類及發展現況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5月），頁315-320，「附錄五·消失的政府智庫——政大國關中心訪談稿，訪談人：政大國關中心鄭端耀主任」。

⁴ 曾熾卿，〈是「升官樂園」也是「招安總部」——千奇百怪的國關中心〉，《財訊》，期145（1994年4月），頁108-110。

⁵ 佚名，〈政要養成所（下）——揭開國關中心的神秘面紗〉，《中外雜誌》，卷52期5（1992年11月），頁133。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留下真名，但筆者比對文章內容與政治大學退休資料，認為是國關中心資深研究人員方雪純所撰。原文是「服務三十三年間，從未發現中心從事過為某一個人、某一政黨私利作個什麼，外界傳聞這樣或那樣的說法，是不可置信的」。

「為國民黨做事」或「黨營」的字眼，都有立派謀私的意義，但是為政府工作又是為國為民的公眾服務。一般對國關中心歷史的了解是：1953年「國際關係研究會」成立、1961年改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1975年進入政大後改為今天的名稱。國關中心在這段時期茁壯與成名，與主政的國民黨必然脫不了關係，無論說它是為政黨或為國家服務，都可言之成理。時至今日，它已轉型成為校園內的學術研究機構。然而，對於為何沒有國民黨／政府的支持，國關中心今天仍能屹立，學界仍少見探討。

中國歷史學者成曉軍在研究曾國藩的智庫（時稱幕府）時，排除權力因素，強調曾國藩本身知人善用的特質才是成功興盛的要件。⁶這樣的見解，可提供研究者從政府與政黨外的角度來探討智庫。智庫是由人才結合的組織，透過招募及甄選的方式網羅人才，並有效運用其知識，是智庫提升其組織價值的關鍵。因此，本文以「前傳」為名，從人才運用的角度切入，考察「國關中心」於1975年納編入政治大學以前的歷史，並著重探討其不同時期的主要領導人物如何推動該單位的發展、建立其國際聲望。同時也透過人員與組織上的連結，將「國關中心」的歷史銜接至抗戰時期，比較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與其後在台時期，領導人對這個機構的經營與機構本身遭受的挑戰。

一、前世：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誕生

中華民國政府針對敵情創設專屬智庫，分析相關國際事務供最高領袖參考，始於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雖有外交部、國防設計委員會、侍從室第五及第六兩組、參事室、軍令部第二廳，加上中統、軍統等情報單位對外交獻策，然而多為國內情報、國際情報及日本情報的混成。抗戰開始後敵方情報需求緊急，於是由蔣介石在1938年初下手令籌組對日情報的「最高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等於是把所有情報單位大雜燴式地綜合在一起，功效不

⁶ 成曉軍，《晚清第一智庫——曾國藩的幕僚們》（台北：捷幼出版社，2002），頁v。

彰。一直到武漢失守後，才將獨立籌組的「國際問題研究所」，直屬於軍事委員會，由王芃生主持。

就重要性而言，抗戰時期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何鳳山認為，該研究所和中統與軍統平起平坐，「情報方面，當時重慶的著名機構，一是國際問題研究所，二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三是中央黨部統計調查局」，而王芃生的業務「雖然號稱國際問題，實際上集中在蒐集日本情報，以及對日問題的研究與探討」，「沒有人比他了解日本更淵博和更深刻」、「最高當局對他的報告見解異常重視」。⁷而就該單位於國民政府中的架構而言，曾長期在「國際問題研究所」服務的辛先惠指出，該單位「經費由侍從室撥給，直接受命於蔣介石，但蔣從未交派一人，所以算得是無人與王芃生爭衡的獨立王國」，故「該所名義上隸屬軍事委員會，實際上屬於侍從室，更實際的是誰也不管，而是蔣介石直接指揮」。⁸

雖然熊式輝曾批評蔣介石用人不外地緣、血緣、學緣，⁹但這三種特別關係並不適用於王芃生身上。王芃生，名大楨，是湖南醴陵人，社會關係與政治生涯卻始於北方；有革命與軍人經驗，但此前兩者成就並未彰顯；也與黃埔系統距離遙遠。然而由於留學等各種原因，他時常前往日本，除精通日文外，著作也相當豐富，有《日本古史辯證》、《日本古史之偽造與山海經蓋國及倭屬燕之義證》、《中日關係之科學研究》、《台灣交涉真相》等十餘本從日本古代到現代的相關著作。他的文筆在 1930 年代的留日中國學生中已十分著名，¹⁰且無論抗戰前後，都在《大公報》、《外交月報》等著名報紙與雜誌上筆耕

⁷ 何鳳山，《外交生涯四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頁 155。

⁸ 辛先惠，〈憶王芃生先生在抗戰時期的國際情報工作〉，《今日中國》（北京），1988 年第 12 期，頁 58；辛先惠，〈王芃生及其國際情報工作的回憶〉，收入陳爾靖編，《王芃生與台灣抗日志士》（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頁 75。

⁹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頁 763。

¹⁰ 蕭贊育，〈我對芃生兄之追思——為王芃生兄逝世二十週年紀念作〉，收入邵毓麟等撰，《王芃生先生紀念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66），頁 6；潘世憲，〈回憶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株洲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下略），《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湖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株洲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0），頁 40-43。

不斷。

在軍政關係密切的時代，王芃生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人員。除擔任過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參事，1918 年之後到抗戰前所有中國對日外交重要事務他幾乎都曾參與，包括華盛頓會議、收回青島與濟南慘案等等。他受到蔣介石的重視，可能與其對日本知識的廣博有關。同樣熟悉日本、與王芃生多有不和的前國民大會代表龔德柏也承認，蔣介石早在 1932 年透過張學良的介紹與王芃生面談之後，對王就有重用之意，後來王能派赴日本擔任參事也是蔣介石的安排。¹¹

不過也有其他人認為，是王芃生的情報分析使蔣決定重用他。第一次是他在西安事變前夕透過外交部的安排，向蔣報告他在東京所獲得的西安兵諫的情報。第二次是他於 1937 年 5 月 15 日，向蔣介石報告日本將於 7 月上旬在華北發動大規模攻勢。而他向蔣介石預報七七事變的 5 月 15 日，後來也成為「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紀念日。¹²

無論是基於王芃生的文筆、對日本的認識或是情報掌握能力，都足以解釋為何七七事變後，王芃生奉蔣命返國，命他做對日情報工作。而如此介於學者、外交與情報能力的人物，不但是對日戰爭時研判日本情報的合適人選，其在報刊上擲地有聲的文筆，也有助於國民政府的宣傳工作。

二、「國際問題研究所」的人員

這個單位約 200 至 500 人，¹³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差距，乃是內外勤之別。

¹¹ 龔德柏，《又是愚話》（台北：文星書店，1965），頁 10-12。

¹² 潘世憲，〈回憶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收入《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頁 42-53；辛先惠，〈憶王芃生先生在抗戰時期的國際情報工作〉，《今日中國》（北京），1988 年第 12 期，頁 56-57。

¹³ 有關該所人員數目，或說約五百人，參考鍾楊瑞先，〈「日本通」王芃生的感情世界（續完）〉，《中外雜誌》，卷 35 期 3（1984 年 3 月），頁 94。另一說二百人，參考陳敦正，〈王芃生不平凡的一生〉，《湖南文獻》，卷 8 期 2（1980 年 4 月），頁 44。

據一位該單位的科長回憶，內勤不到二百人，但外勤龐大。¹⁴內部分敵偽組、國際組、圖書資料組、總務組、機要組、無線電台等等，主要從事日本內政與軍事、特務、外交、日本與國際經濟等研究。不少文獻都強調他的情報準確，如預測到日本進攻珍珠港等。邵毓麟回憶「珍珠港事變」三週前，王芃生已將日本東進與南進的戰鬥序列呈報，且由邵毓麟告訴當時美國駐滬領事，即後來的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邵毓麟 1944 年赴美與在國務院服務的莊萊德重聚時，後者即盛讚中國情報準確。¹⁵

抗戰時期中國亟求英、美參戰，如此情報當時應不獲美國重視可以理解。就重慶是否預先通知美方而論，不少美國的出版品認為軍統的戴笠已將此情報傳到華府。¹⁶不過「國際問題研究所」的人員認為這是該所分析出來，只是由於呈報需經軍令部二廳，該單位由軍統控制，故被戴笠截獲，才成為戴笠的功勞。也由於這份情報由該所於 1941 年 10 月 26 日所呈報，故該日又成為該所紀念日。¹⁷

基於「國際問題研究所」之情報價值，英國在該所派駐一「顧問室」。而蘇聯方面則透過大使館的武官，和該所出身台灣民眾黨的謝南光保持秘密聯繫。¹⁸「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情報受到重視，與運用敵境人員有關。該所正式編制之外還有一「青山研究室」，由不會說中文的日本反戰人士組成。而無論

¹⁴ 若將該所電台台長回憶考慮在內，情報人員遍布香港、上海、北平、天津、浙江淳安、江西鉛山，在歐美、印度、越南乃至日本國內，都有情報人員活動。台灣也有資料指出，王芃生的情報線遠及緬甸。參考簡伯村，〈懷念王芃生及國際問題研究所〉；郭福生，〈我所知道的王芃生及國際問題研究所〉，以上二文皆出自《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頁 73、132；劉傑佛，〈追思芃生先生〉，收入邵毓麟等撰，《王芃生先生紀念集》，頁 51。

¹⁵ 邵毓麟，〈追念王芃生先生〉，《傳記文學》，卷 8 期 5（1966 年 5 月），頁 28。

¹⁶ 認為戴笠將日本偷襲珍珠港情資傳到美國的相關作品，請參考 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283; Kathryn Meyer and Terry Parssinen, *Webs of Smoke: Smugglers, Warlords, Spi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Drug Trad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 208; Hua-Lun Huang, *The Missing Girls and Women of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Jefferson: McFarland, 2012), pp. 38-39.

¹⁷ 潘世憲，〈回憶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收入《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頁 53。

¹⁸ 潘世憲，〈回憶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收入《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頁 54。

敵後或內勤，很多又是殖民統治下，熟悉日本國情的韓籍與台籍人員。蔣介石的重要情報幕僚唐縱回憶，該所「多為精通日本政情之臺韓籍同志與留日學生，經以一部份派赴敵區，搜集情報；一部份留在後方，擔任內勤」。¹⁹

台灣當時屬日本，台灣人在語言與文化上對中日雙方的熟悉，在王芃生的情報蒐集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前述他向蔣介石報告日本即將侵華的情報，就是王與幾位台灣人士——謝南光、李萬居、張錫祺、張錫鈞——的研究結果。²⁰ 台籍有名望人士者，除前述協助判斷日本侵華時間之人士外，尚包括游彌堅、黃朝琴、黃國書、蔡培火及連震東等人。²¹

因多屬熟悉日本的研究人員，分析敵情時往往可以從普通材料中判斷，例如：

第一件工作……交給我一疊報告東京方面日本股票行情的電報，要我整理，繪製圖表。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我們國研所一直利用敵方股票行情來分析敵情……股票行情電報是上海站顧高第發來的，內容大約是十二三家大公司的股票，有東紡、日棉、鏡紡等輕工業，也有日鐵、八幡等重工業方面，是代表大財閥集團，也就間接代表著各政黨和陸海軍部的動向。我們統計表上的最後一家公司是「日魯」（漁業株式會社），它可以暗示日本海軍方面的軍事動向，也就是說這種股票的漲落可以反映出日、蘇兩國關係的形勢來。比如：當張鼓峰戰役發生時，「日魯」股票雖小有波動，但很快就平穩了。我們據此判斷張鼓峰戰役不致擴大，不會影響日蘇兩國外交關係。在當時，我們做這樣的判斷是不受歡迎的。有人從自己的願望出發，希望日蘇戰爭打起來……我們利用股票行情的變動來驗證我們研究日軍動向的結論，十之八九是很準確的。即使分析日本的政治動向、內閣更替等也都是肯

¹⁹ 唐縱，〈我對芃生先生之懷念〉，收入邵毓麟等撰，《王芃生先生紀念集》，頁4。

²⁰ 潘世憲，〈回憶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收入《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頁44。

²¹ 陳敦正，〈「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下）〉，《中外雜誌》，卷32期5（1982年11月），頁102。

定的。²²

既然是情報單位，各地電台也會發來共產黨的情報，但王芃生認為該所專職於日本情報，不介入黨派之爭，這些情報不是存檔就是銷毀。²³而爲了擴大蒐集敵後地區的情資，國研所的內外勤都有共產黨或思想左傾人物；龔德柏對該所充斥共黨人員指證歷歷，甚至稱王芃生本人就是共產黨，²⁴而可疑名單中最有名的台灣人就是謝南光。

於是在與國民黨的敵人——共產黨與日本人——的合作下，「國際問題研究所」專心蒐集來自各地的情報，按時印製《情報摘要》與《研究報告》，送達政府與各國駐重慶大使館。爲了要提升這些報告的水平，王芃生也十分重視培育青年後進：

王芃生自己有才，也很愛才，對青年尤其愛護。只要會一種外語，動筆翻譯一些外文資料，或有其它專長，就可以在國研所立腳，而且能得到相當好的待遇。我進國研所時，離開學校才幾個月，只因我是學圖書館專業的，有一技之長，就給了我一個研究員的職稱。有的研究人員能寫出一定水平的專題研究報告，王芃生更是格外器重，不是研究專員，就是正副科長。即使有些年新手進所後一時拿不出什麼東西，王芃生也不嫌棄。當有人在背後議論，說他們是光吃飯不做事，王芃生還爲之解釋，他曾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只要他們在認真學習（包括外語和有關國際知識等），暫時拿不出東西也沒有關係。現在拿不出，將來會拿得出，他這種態度，對我們年輕研究人員的鼓舞是很大的。爲著提高所內研究人員的素質，他還把教和學結合起來，經常開辦各種外語講座，請一些外語基礎好的老研究人員講課，所裏的同事都踴躍參加，我就先後參加過日語和英語的學習。由於是王芃生提倡，這樣的講座每個星期都有幾次，而且都是在工作時間進行，這在當時國

²² 潘世憲，〈回憶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收入《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頁 47-49。

²³ 郭福生，〈我所知道的王芃生及國際問題研究所〉，收入《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頁 75。

²⁴ 龔德柏，〈又是愚話〉，頁 1-41。

民黨各機關是絕無僅有的。²⁵

三、失敗的改制

由於王芃生於情報工作之外，在平面媒體多有撰述，文學家張之淦稱讚他善用該所資源，以精闢文章在時局混沌時影響眾多讀者（如 1941 年 9 月在《大公報》發表的〈敬告羅斯福總統〉預言日本將突襲美國），堅定必勝信念，足使「懦夫有立志」。但張之淦也指出，雖然王芃生集情報、外交與宣傳於一身，可是研究所「是一個兼具學術研究與策略設計雙性質的機關」，而王芃生「如果不是一位專家學者，就不能領導從事這些研究。他如果純粹出之以學者的態度，則又難滿足適應設計上的要求」，結果使得他的知識與著述因應戰爭需要，缺乏「嚴謹的純粹學術立場」。²⁶

王芃生的研究缺乏學術價值，也正是該單位的問題。「國際問題研究所」是因應國家危難的臨時性結構，因對日戰爭而出現，其生存也隨對日戰爭結束而面臨挑戰。從「最高調查委員會」到「國際問題研究所」，蔣介石屬意的負責人選一直是王芃生，但是王芃生不屬於中統或軍統，與國民黨各主要派系淵源也有限，這也是「最高調查委員會」在 1938 年曇花一現的主因。²⁷「國際問題研究所」產生於武漢失守之後，象徵各單位必須放下成見一致對外，該所也因此有一段時期能專心對外。

這個「名義上隸屬軍事委員會，實際上屬於侍從室，更實際的是誰也不管」且由「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獨立王國」，在對日戰爭末期就顯示出結構上的缺陷。首先，該所與軍統等單位在情報上的矛盾關係從未停止，也由於王芃生缺乏自己的人馬，很多研究所內的人員都有外來派系勢力，而該單位與共黨人物的關係，更成為被鬥爭的好理由。這些鬥爭蔣介石可能也知道，其親人曾親

²⁵ 胡又深，〈我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工作經歷〉，收入《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頁 141-142。

²⁶ 張之淦，〈略談王芃生先生〉，收入邵毓麟等撰，《王芃生先生紀念集》，頁 105-110。

²⁷ 張令澳，〈也談王芃生和國際問題研究所〉，《今日中國》（北京），1989 年第 12 期，頁 36-37。

見蔣介石在王芃生的公文上批「你比共產黨還共產黨」。²⁸

其次，王芃生縱有長才，但缺乏派系支持，戰後不但自己無法取得合適政治職位，也無法令任何單位接受這個半政策半學術的機構。純就協助政策分析，軍令部與外交部皆拒收。若是用作研究單位，傅斯年表示中央研究院太小，容不下「大菩薩」。²⁹由於缺乏黨、政府與學術單位的支持，無法安排該所人員，幾乎是戰爭一結束，王芃生就以 54 歲英齡抑鬱而終。他過世前仍在擔心研究所的未來，寫了六個字「研究所事如何」即撒手人寰。³⁰

不過他在逝世之前已知自己健康不佳，故建議蔣介石將這個單位交給在侍從室工作，同時也具日本與外交專長的邵毓麟。邵毓麟接任這個單位後，第一個工作就是為王芃生治喪，其規格比照戴笠，除了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墓碑與祭文分別由張群與蔣介石所撰。由於仍無法解決改組事宜，邵接下來的主要工作是遣散數百名工作人員，「國際問題研究所」就此結束。

檢視「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短暫生命，可以看出幾個特色：第一，即使王芃生受到軍統等情報派系排擠，和蔣介石淵源也很淺，但他憑其專業能力仍受蔣介石拔擢，從事日本資訊的專業分析與宣傳的工作。第二，這個單位重視雇用與運用敵人，因其分析日本資訊有過人之處，故情報有一定地位，進而引起盟邦重視。第三，王芃生重視人才培育，其中的台籍人士，不少在戰後都成為接收台灣的官員，等於是台籍與國家明日之星的培訓所。第四，這個單位的出現和消失，端視國家是否面臨大敵。它是在現有情報架構外，臨時依領袖意志建立的專業分析單位，故大敵消失，單位本身存續與否就出現問題。以上特點後來在這個單位於台灣重生時，也再度出現。

²⁸ 陳爾靖，〈王芃生與台灣抗日志士〉，頁二，編序。

²⁹ 萬發真，〈抗戰時期的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山東理工大學學報》，卷 24 期 1（2008 年 1 月），頁 53。

³⁰ 熊琛，〈王芃生傳〉，《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7 期（1989 年 12 月），頁 132。

四、重生：總統府資料組「政策研究室」

就成立的方法而言，「國際問題研究所」和總統府資料組「政策研究室」成立的模式類似。1953年2月17日，蔣介石下手令，設立助其了解國際政治研究的單位。根據學者的研究，蔣介石跳過體制下手令往往出於軍事原因。³¹ 審度當時局勢，韓戰硝煙未散，中華民國也尚未與美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值此危急存亡關頭，成為「政策研究室」在台灣成立的主要背景。蔣介石的手令如下：

謀略組織最為急要，其業務可分為（一）業務：1 諜報，2 反間，3 策反，4 宣傳，5 謀略。以謀略之方針與需要似製假情報，間接傳達於對方，不僅使之對我政策判斷錯誤，而且轉變其心理以適應我策略之運用，分以上五組。（二）地區：1 美國，2 英國，3 俄國，4 共匪，5 日本，6 中東，7 東南亞（印、泰、緬、越、菲、印尼、馬來），8 台各黨派。分為以上八組。可先行設計選擇少數相宜之人建立小範圍之機構，或可名為政策研究室。待基礎確立後再行逐漸擴充可也。此事最為重要，並留心物色人才入手，其經費可擬預算，務自明正開始實施。對於共匪俄寇其大陸匪區之實在情形，應加幾專門研究，希即蒐羅人才設立一小規模之機構，專司其事。

國防部總政治部蔣主任勛鑒：對於在心理作戰及宣傳方面有研究之人才，應即留心物色網羅。蔣中正文國防部總政治部辦公室抄。³²

蔣介石這三份手令看來有些雜亂，簡言之就是要請他的兒子物色人才，專門研究敵人，以國際為主要方向。同時也看得出來，蔣介石把台灣的重要性排在最

³¹ 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頁27-49。

³² 〈總統手令一〉、〈總統手令二〉、〈總統手令三〉，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本室業務會報，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

後，且各黨派被當成潛在敵人。

蔣介石手令交給兒子，如何組建就由蔣經國詮釋。蔣經國是蔣介石失去大陸後，在台灣重建情報工作的新領袖。其演變大約是蔣介石於下野後先到台灣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因應蔣介石在中國大陸中統、軍統等情報系統瓦解，由在大陸時期的軍統情報領袖唐縱領軍很短一段時間，就由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接手，該委員會主要工作即改善情報，重建政工，並直屬於總裁辦公室。蔣介石復出當總統之後，就銳變成「總統府資料組」，持續重整亂成一團的情報工作。

就蔣經國所詮釋的手令而言，蔣介石上述國內外情報等工作，就是由資料組負責，而蔣介石命名的「政策研究室」因而在 1953 年 4 月 1 日成立，附屬於總統府資料組，專門從事研究工作。³³蔣經國組建的結果，並未將蔣介石手令中的「台灣各黨派」包括在「政策研究室」的範圍內，也突顯該「政策研究室」主要並不針對「國內」或「黨派」。

專研國際事務的「政策研究室」的專業人員均為一時之選，初分以下幾組：蘇俄、匪情、美國（含聯合國）、日韓及歐洲（包括東南亞），由卜道明、王崇五、馬星野、汪公紀、李直夫等分列為各組召集人。³⁴由於前四者都與反共抗俄直接相關，可見得這個單位的「國際」是以對敵為思考核心。

五、政府體系中的「國際關係研究會」

無論何人擔任主任，實際領導人是蔣經國。蔣經國和「政策研究室」的關係很近，常和他們「十二人坐一部車到圓山去研究問題」。³⁵這個單位與大陸

³³ 涂成吉，《克萊恩與台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頁 99-101。

³⁴ 〈國際關係研究所業務簡報資料，五十三年九月十八日〉，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長官訓詞，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

³⁵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五十四年四月一日在十二週年紀念日於中央日報大樓七樓會議室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時期「國際問題研究所」最大的不同，就是蔣介石底下的情治單位基本上由蔣經國全部接手，因此在建立之初，就減少了過去中統、軍統等人員激烈的派系問題。

總統府資料組於 1955 年 3 月 1 日成爲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因此也成爲國家安全局的一個機構。其後的發展，國關中心的網站上有如下說明：

「國際關係研究會」，於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一日，由邵毓麟、李白虹、卜道明、馬星野等各位先生發起成立。「國際關係研究會」向內政部註冊爲人民團體。」……「國際關係研究會」於五十年呈准教育部改爲「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擴大對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之聯繫與合作。³⁶

這份資料可能是根據國關中心在 1983 年的一篇中心歷史簡介，³⁷簡言之是「國際關係研究會」成立十年後才變成「國際關係研究所」。但值得一提的是「國際關係研究會」在 1958 年 2 月前對外沒有活動，³⁸且開始活動後即在 1961 年擴展爲更有學術意涵的「國際關係研究所」。

無論是「國際關係研究會」或「國際關係研究所」，國安局內部行文仍稱「政策研究室」。蔣經國時常親訪這個「政策研究室」/「國際關係研究會」/「國際關係研究所」並做指示，該單位更常直接對一位「蔣先生」（即蔣經國）行文，而非透過國安局上呈，可見其雖爲國安局下一員，但實際獨立性很強。換言之，它表面上屬於國安局，也由該單位支持預算，但蔣經國常直接指揮。如此由領袖因應軍情，安插專門研究敵情與國際的機構進入原有情報體系，卻又不完全接受情報單位管轄的特色，極爲類似「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翻版——「名義上隸屬軍事委員會，實際上屬於侍從室，更實際的是誰也不管，

³⁶ 參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網站：<http://iir.nccu.edu.tw/index.php?include=aboutus&mode=history>（2013 年 1 月 6 日檢索）。

³⁷ 缺作者，〈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歷史沿革業務概況與未來發展〉，《問題與研究》，卷 22 期 7（1983 年 4 月），頁 5-8。

³⁸ 〈國際關係研究所業務簡報資料，五十三年九月十八日〉，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長官訓詞，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

而是蔣介石直接指揮」。

要了解一個國家安全幕僚單位為何從幕後走到幕前，透過包裝來對外從事學術活動，必須了解蔣氏父子最早的指示。按照國關中心網站上的敘述，這個單位成立的初衷是：

1. 提供決定政略戰略之參考資料與意見。
2. 將當時國際及中國大陸所發生之重大事件及時提出研究報告與建議。
3. 透過研究成果增進國際人士對我國之瞭解與支持。³⁹

這三大要務的說法，也可能是由 1960 年代演變而來。當時的三大目標是：

1. 提供決定政略戰略之參考資料。
2. 代總統閱讀當前國際上最重要的著作與輿論反應，提出報告。
3. 研究敵情、謀略、心戰並透過我們的研究讓國際間有了解。⁴⁰

這些說法和原文都有些出入。更早的三大工作目標出自蔣介石於 1953 年 9 月 19 日召見「政策研究室」人員所說：

可以助我個人對問題之研究。

替我個人集中現有各種政策上意見。

減少我的考慮，幫助我對於國際問題之研究。⁴¹

蔣介石原本只想請研究人員幫領袖「個人」作國際決策，但為何不久之後就被詮釋為「讓國際間對我國了解」？從「個人」到「國際」，仍然淵源於 1953 年 9 月 19 日。蔣介石該次訓話中最特別之處，即是交代「政策研究室」要辦一個「國際關係的權威刊物」。⁴²至於何謂權威性刊物？1950 年代的文件中並

³⁹ 參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網站：<http://iir.nccu.edu.tw/index.php?include=aboutus&mode=history>（2013 年 1 月 6 日檢索）。

⁴⁰ 〈范副局長主持本所簡報紀錄，五十五年三月四日〉，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長官訓詞，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

⁴¹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⁴²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在圓山遠廬講

沒有提，但 1960 年代的文件中，一位該次會議參加者指出，蔣介石要求的是能與美國 *Foreign Affairs* 媲美的刊物。⁴³

國家領袖要求情報單位呈給「自己」的研究報告公開，且要與國際大刊物競爭更是特殊；檢視其手令中雖無出版刊物之意，但強調「心理作戰」與「宣傳」。完全不同的概念交織起來，表示蔣介石雖然已有情報單位，但希望這個新單位除了提供專業敵情分析，也要有宣傳的能力，這也是「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再版。

這個單位的首位主任就是「國際問題研究所」末代所長邵毓麟。邵毓麟指出，他奉蔣介石手諭建立「政策研究室」，但隨即面請蔣介石改名為「國際關係研究會」，「以內心懷念芄生先生研析國際問題之生前功績所由來」。⁴⁴

六、學術化的幕後推手：蔣氏父子

蔣氏父子雖不是這個單位的「主任」，但關係非常直接，也主導了發展方向。蔣介石 1953 年 2 月 17 日下手令成立該單位後，蔣經國在 1953 年 4 月 23 日首次工作指示中，即交代現階段工作要領，大致與蔣介石手令相同：

1. 一般問題之研討，作為總統決策參考。
2. 各方輿論之反映，摘要呈報總統做為決策參考。
3. 蒐集重要書刊摘譯給總統決策參考。
4. 培養人才，擴大資料來源。⁴⁵

可以看出來該單位一開始籌設時，只想到給總統尋找好的人才提供政策建議。

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⁴³ 〈范副局長主持本所簡報紀錄，五十五年三月四日〉，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長官訓詞，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

⁴⁴ 邵毓麟，〈追念一個大不平凡的國民黨員〉，收入邵毓麟等撰，《王芄生先生紀念集》，頁 28。

⁴⁵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二年四月廿三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在 1953 年初的環境下，這樣的想法很實際。不久，蔣介石於同年 9 月召見各研究人員，談論「權威期刊」事宜，10 月，蔣經國再度召見各研究人員，指示今後的研究宜分「一為有系統的理論研究，一為對實際問題配合總統府決策，進行設計性研究」。⁴⁶換言之，在蔣氏父子最早的構思中，「政策研究室」除了提供政策，也要有學術理論研究。

一個月後，蔣經國再度召開會議，除了重申這兩個研究方向：「比較有系統的理論」與「現實問題」，也承認目前人手不足，以現實問題為主，要研究理論必須「等本室人手加多」。即使如此，總統交代的「國際關係權威刊物」，也要開始研究籌備。到了 1953 年 12 月，蔣經國就要求儘量擴大資料來源：「應購買者，可儘量購買，如需外匯，自可照撥」、「關於籌辦刊物，提前辦理，研究人員可酌予增加」、「對美、日、韓、東南亞等國家之大學，密切連繫，互相交換材料」。⁴⁷

1954 年 3 月，蔣經國再度指示「研究工作是長期性的，不能急，愈急愈得不到效果……每（研究）組兩三人是不夠的，我贊成補充。但因為工作特殊與重要，不能隨便補，對低級人員，我贊成提拔有為青年，使在工作中培養成幹部」。⁴⁸1954 年 5 月，蔣經國再次催促辦雜誌：「總統訓示我們辦一種雜誌，這件事希望大家研究。我們要辦的不是普通的，是特殊的和權威性的。希望能積極進行」。⁴⁹

⁴⁶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二年十月廿七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⁴⁷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⁴⁸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⁴⁹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蔣氏父子對底下的情報機構，反共抗俄之外，還要求研究品質，允許動用外匯，與外國大學聯繫，培養青年研究人員，辦理「國際關係權威刊物」，也再次驗證蔣介石的要求不只是消息，更重視國際宣傳。這也解釋了抗戰時期中統與軍統情報蒐集能力縱然強大，但王芃生在內部夾擊下仍然獲得蔣介石重用，負責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原因即在於其專業與宣傳能力。

這個單位逐漸從簡單的情報，演化為強調研究品質與國際合作。蔣經國在1956年12月31日指示，「研究室有兩個主要任務，一為研究工作，一為儲備人才」。並要求從隔年起國內部份「有關方面將情報資料儘量給研究室參考」，而國外部份「儘可能與美國與西德之蘇俄研究單位連繫並交換資料」。⁵⁰1957年2月，蔣經國除了再次要求培養青年，儘量購買資料，還指示這個研究室「最大的缺點，在其研究成果僅能在小範圍內起部份作用，未能充份運用」，還鼓勵「將我方研究成果送到外國，達到宣傳效果，同時又可換得他們的資料」。⁵¹「政策研究室」在隔年走向外界，正式以「國際關係研究會」登記成為人民團體，自有蔣經國的指示為依據。

針對台灣充滿了反共八股，蔣經國常批評其「空洞而不切實際」，⁵²常提醒「研究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應與研究大陸問題相關聯」，⁵³也指出「研究匪情最大的毛病，就是只掘起短處，未研究其長處……要打垮共匪，必須研究其長處，決不可帶偏見來看問題」。⁵⁴第一本刊物名稱為《問題與研究》，蔣

⁵⁰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在中山北路招待所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⁵¹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⁵²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⁵³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六年十二月廿八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⁵⁴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六年五月九日在圓山遠廬講詞」〉，

介石閱後在中常會大為贊許。⁵⁵但蔣氏父子並不以此為滿足，蔣經國進一步要求將《問題與研究》月刊公開化，「使內容更充實，帶研究學術性質，各大學極需要此類刊物」。⁵⁶

為拓展國際交流，1958年蔣經國說「研究室對美國及亞洲若干國家，均有深刻之研究……希望與歐洲各反共國家團體多多聯繫」。⁵⁷他顯然認為《問題與研究》不夠，1959年再催促辦理「權威雜誌」：「幾年來，我常說要出版一種權威性公開雜誌，希望明年能做到。這種雜誌要有很正確，很明顯的主張，要有人家沒有的資料」。⁵⁸「權威性公開雜誌」必是由外文撰寫，「國際關係研究會」需較多時間準備。1961年2月，他除了稱讚「政策研究室」已對國內外逐漸形成影響力，也繼續催促「英文刊物，應積極進行，拿出來要像樣子，要超出台灣現在一般英文刊物的水準」。⁵⁹

至此，對外稱作「國際關係研究會」或「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的學術性質已建立基礎：培養人才，在理論與實際的角度下，研究中國大陸問題。就「國關中心」國際聲望的建立而言，蔣經國在1950年代積極的指示、催促與叮嚀，確實深具影響。若和中國大陸於1956年設立的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55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在中山北路招待所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56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六年五月九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57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七年十二月廿三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58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四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圓山遠廬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59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五十年二月廿三日在台北市溫州街137號講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同性質智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相較，其國際宣傳之任務就更明顯。該所所刊《國際問題研究》於 1959 年出版，而且不久之後就因政治原因停刊數年，到 2006 年為止約 46 年間，也只出版了 154 期，且 2005 年才有第一份英文刊物。⁶⁰

七、運用共產黨：卜道明與郭華倫

蔣氏父子除了重視學術人才之外，抗戰時期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曾大批運用日籍、台灣與韓籍人員，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雖然是敵境人員，但是由於語言與文化之便，更能精確解讀敵人的資料。蔣經國原本的蘇聯與共黨經驗，使他十分熟悉反共抗俄的「人才」。具日、韓專長的首任邵毓麟所長沒有任職太久，一年後（1954 年 11 月）就由具俄文專長的卜道明接任。

卜道明與蔣經國在莫斯科即為同學，與中國共產黨的淵源遠達陳獨秀，在北伐時當過蔣介石和鮑羅廷的秘書，後來在政治道路上選擇國民黨。因其俄文專長，在外交部做到亞西司司長，也曾與蔣經國一同參加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在台北，蔣經國住在中山北路六條通，卜道明住在七條通，兩人下班後常換上拖鞋互相造訪。⁶¹

卜道明雖然不算是著作等身的學者，但依其對俄共、中共與蔣氏父子的了解，十分適合主持這樣的機構，蔣經國的多次提升研究與學術聲望等指示，也多在他手上完成。卜道明時期已為今天各主要期刊奠定基礎，如《問題與研究》在 1956 年出刊時，尚未對外發行，至 1961 年 10 月 10 日起開始每月公開發行，每次約 2,500 份。《匪情月報》（今《中國大陸研究》）的發行背景乃是由於各情治單位各辦各的「匪情」研究，於是國安局要求情報局、調查局、國民黨

⁶⁰ 象牙塔，〈新中國第一個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知識》，期 14（2006 年 7 月），頁 65。

⁶¹ 佚名，〈政要養成所（上）——揭開國關中心的神秘面紗〉，《中外雜誌》，卷 52 期 4（1992 年 10 月），頁 113。

等單位全部停辦，由國安局統一籌劃：「中六組負責黨政，情報局負責經濟，調查局負責人事、文教」，⁶²該月報乃於 1958 年 1 月出版，每期約印 1,500 份。《大陸匪情分析》英文月刊於 1962 年 12 月出版，每期 900 份，專供國外人士參考。⁶³

除了出版刊物，「政策研究室」加強對外活動，在內政部登記為人民團體，以「國際關係研究會」對外，後來更進一步在 1961 年成為教育部立案下的私人學術機構「國際關係研究所」，並且走出圓山，轉入市中心《中央日報》大樓辦公，都是在卜道明任內完成。

朝公開化邁進，可說是卜道明奉蔣經國之命推動的。但受到外界重視，就有賴更專業的共產黨了。「政策研究室」的資料來自各「匪情單位」，故解讀的研究員常受過完整的軍事教育，也有來自「石牌訓練班」赴大陸出過任務的情報人員，雖不一定有極佳學術分析能力，但其歷練對中國以外的世界想了解共產黨者則極為珍貴。國關中心對這批早期研究人員，有如下的介紹：

當時之研究人員大約由三大類不同背景的人才組成，其中第一類為在國共鬥爭時期對「匪」有鬥爭經驗之情治前輩及學者，例如，李天民先生、札奇斯欽教授、尹慶耀先生和朱文琳先生等；第二類為在國共鬥爭時期被俘之中共情治人員，例如，郭華倫先生、姚孟軒先生和劉懋枏先生等。第三類為在台接受完整大專教育的當時年輕人才，例如，張虎先生、李柏泉先生和孫震芳先生等。⁶⁴

第三類人物在 1960 年代下半期才從台灣網羅，而前兩類和共產黨打過交道的人物，則有能力從各種蛛絲馬跡中蒐集並研判中共黨政動向。中、英文版之《中

⁶² 佚名，〈政要養成所（上）——揭開國關中心的神秘面紗〉，《中外雜誌》，卷 52 期 4，頁 113。不過到了 1960 年代中，由於文化大革命，上述單位又開始研究匪情，並有正式出版品。軍情局、調查局與陸工會分別有《中共研究》、《共黨問題研究》與《中國大陸》等雜誌。

⁶³ 〈國際關係研究所業務簡報資料，五十三年九月十八日〉，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長官訓詞，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雖然依吳俊才所言，該英文刊物於 1962 年出版，但作者能找到的最早的正式版本是 1966 年。

⁶⁴ 參考國關中心中國政治研究所的網站：<http://iir.nccu.edu.tw/chinapolitics/introduction.htm>（2013 年 1 月 7 日檢索）。

共人名錄》於 1967 年出版，資料詳盡，深受學界喜愛，即此一能力之展現。

就蒐集情報的手法而言，除了軍情單位的協助，也透過各種管道從世界各地（特別是香港）蒐集資料。共黨思維下的獨特分析方式，可藉筆者與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蘇起的訪談供參考。他曾於 1980 年代初在國關中心任職，官至副主任。當時即聽聞許多專業研究人員雖無碩、博士學位，但軍情單位從中國大陸蒐集來的官場訃文，透過他們的實務經驗，分析奠祭人員的排序先後，即可推測出中共要員權力的變遷。

「共匪」的運用中，最有名的應該就是郭華倫（又名郭乾輝）。他曾在中央蘇區擔任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幹部，後來當上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組織部部長。在對日抗戰初期被國民黨的中統局逮捕後轉變立場，就一直在調查局服務，專門蒐捕舊日同志。1946 年郭華倫被派到台灣，出任台灣省調查處處長，繼續搜捕台灣共產黨。他在台蒐捕「匪諜」之餘，還努力撰述，曾於 1954 年在調查局出版《台共叛亂史》。

郭華倫於 1963 年調查局副局長任內改調國關中心副主任，主管《匪情月報》之餘，同時發表《中國共產黨史論》（中文筆名陳然，英文版書名為 *Analy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作者署名 Warren Kuo）。由於連中國大陸都還沒有相關著作，在中國大陸資訊相對封閉的年代，更使“*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名揚海外。

八、國內養士與國際養望：吳俊才

在 1953 年「政策研究室」首次成立時，吳俊才的資歷有別於其他人，被單獨列出，並以「兼任研究委員」任用。⁶⁵他與其他人有許多不同，首先，他年紀很輕，只有 31 歲，除了英文好，也已在《中央日報》的重慶、印度與香港等分處擔任過特派員與主筆。曾留學英國與印度，也是台大與師大兼任教

⁶⁵ 〈政策研究室第一次會報資料〉，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本室業務會報，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

授。就背景而言，他沒有官僚與軍人的資歷，卻有較他人更為突出的學術與撰述能力。

吳俊才很可能是「政策研究室」美國組研究委員暨《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推薦進來的，因其夫人為馬星野之妹。馬星野與蔣經國很近，因蔣經國曾說「馬先生和我可以說在同一個房間工作，精神上非常密切」。⁶⁶另一位負責東南亞研究的李直夫曾任中華民國軍事代表團駐印度副團長，可能也對吳俊才很肯定。種種原因加起來讓吳俊才有機會進入這個單位，憑其有別於他人的專長，受到蔣經國的培植與重用。

然而如前所述，這是一個混合的單位，有情報也有研究，雖然沒有舊日的派系鬥爭，但多少有軍文之爭。卜道明在位時雖極力培養吳俊才，讓吳俊才主編《問題與研究》雜誌，惟卜重病時，國安局雖指派吳俊才代理主任，第一副主任王崇五是負責「匪情」的元老研究員，也有軍統背景，竟強勢安插軍方人馬進入「國際關係研究所」擔任編輯。⁶⁷

不過這已非舊時代，層峰知曉之後，王崇五遭到強迫退休。吳俊才於 1964 年正式接任，新的兩位副主任為立法委員暨國際關係學者鄧公玄，另一位為前述調查局副局長郭華倫。蔣氏父子調任這一文一武捍衛吳俊才，該單位由學術領軍，再無可動搖。

蔣經國刻意培養出的吳俊才，上任後果然不負所望，更加擴大了這個情報單位的國際學術路線。首先，將卜道明時代的英文出版品提升為 *Issues and Studies*，其研究之影響力延伸至今。其次，成立資料供應中心，在《中央日報》大樓中特別闢外賓閱覽室，「對國際研究機構不但能提供資料，而且為來華的外國學人，給他們研究的便利……本年(1966)一月廿一日奉總統批示准予照辦……我們希望將來此一資料中心成立之後，國外學人到此均能與資料和研究

⁶⁶ 〈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摘要，四十二年至五十六年：「五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在松江路青年共救國團禮堂」〉，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研讀蔣先生講詞，四十二年至六十三年」。

⁶⁷ 佚名，〈政要養成所（上）——揭開國關中心的神秘面紗〉，《中外雜誌》，卷 52 期 4，頁 114。

人員直接接觸，使他們盡量獲得需要的滿足，以便返國後為我們做一點宣傳」。⁶⁸

吳俊才於 1966 年的做法很快獲得回應。著名期刊 *The China Quarterly* 於 1968 年 10-12 月號這一期有如下記載：

隨著國民黨出版品分析水準大幅提升(a great improvement)，欲前往台灣從事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之學者而言，其情勢自 1966 年中以來有極佳之轉變(a sharp upward turn)。「國際關係研究所」為方便外來學者從事學術性研究，於該所特闢「外賓閱覽室」一間，外來學者可看到台灣一些機構出版的研究資料與官方圖書館目錄索引。此外，以及一小批工作人員極力協助外來研究人員獲其所欲參閱之資料，或介紹其它有相關資料的單位。該閱覽室（係該所唯一設有冷氣之房間）另設有性能極佳之理光牌影印機、膠卷閱讀與複製機，及可供五六位學者工作之書桌。⁶⁹

當時中國大陸相對封閉，台灣的情蒐單位不斷地有學術資料產生，「國際關係研究所」毫無疑問已成為國際間「中國研究」的重心。為了再加強聲望，吳俊才也努力建立國際學術合作，使研究工作更擴大視野。故與世界各著名學術機構合作，包括資料交換、研究人員交換及召開學術會議等。當時建立的合作單位有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內閣調查室、西德自由大學及慕尼黑大學等等。⁷⁰

為鞏固已有的關係，加強友我輿情，辦跨國會議維持例行連繫是很好的方法。至今仍然在舉行的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首次即於 1970 年 12

⁶⁸ 〈范副局長主持本所簡報紀錄，五十五年三月四日〉，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長官訓詞，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

⁶⁹ Gordon A. Bennett, "Hong Kong and Taiwan Sources for Research in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6 (October-December, 1968), p. 136 譯文。

⁷⁰ 佚名，〈政要養成所（上）——揭開國關中心的神秘面紗〉，《中外雜誌》，卷 52 期 4，頁 114。

月在台北舉行，蔣介石十分重視這件事，要求吳俊才「每月提報籌備進度」，⁷¹蔣介石夫婦並於開會第二天親赴陽明山中山樓以茶會歡迎約六十名中外學者。由於這個會議包括了許多極有影響力的美國學者如惠廷(Allen S. Whiting)、奧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施樂伯(Robert A. Scalapino)、韋慕庭(C. Martin Wilbur)、饒大衛(David N. Rowe)、沃克(Richard Walker)等人，不但可以看出美方學者一定是基於重要性而爭相參加此會，也可看出「國際關係研究所」在國際學界的影響力。

蔣氏父子也透過吳俊才走訪國際，吸收中國政策意見再回來報告。以一次1970年2月17日吳俊才面報蔣介石其美國訪問行程為例，吳俊才在1969年底曾遍訪美國二百多名教授，但蔣介石只詢及施樂伯有何意見。⁷²施樂伯在1959年的〈康隆報告〉(Conlon Report)中鼓吹台獨，才於1969年初訪台與蔣經國及王昇見面，談的內容應該和吳俊才回報的相差不遠：「台灣經濟愈發展，政治問題愈嚴重，因本地人必更加爭取參政機會……美國無法預測中國大陸局勢，故不談未來政策。但眼前的事實則應承認兩個中國之存在……我們希望做到使台灣和大陸和平共存，最後做到使台灣獨立」。⁷³

也許是巧合，約在吳俊才面見蔣介石的同時，蔣經國針對國際局勢，向國安局指示「過去我們說以不變應萬變，現在我們不能再這麼說」。⁷⁴14個月之後，蔣介石在與美國總統特使墨菲(Robert Murphy)會談中，正式接受了美國建議，放棄了在聯合國堅持多年的「一個中國」。再6個月之後聯合國代表權的

⁷¹ 〈五十九年九月廿一日國際關係研究所呈國家安全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國際性會議呈報蔣先生，五十九年至六十七年」。

⁷² 〈五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國際關係研究所呈國家安全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簽呈蔣先生，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

⁷³ 〈五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吳俊才自美國舊金山呈國家安全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簽呈蔣先生，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Robert A. Scalapino 來台部份請參考〈對斯卡拉賓諾教授來訪的印象——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教授 / 國際關係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遵權撰〉，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美國史卡拉賓諾教授訪華，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

⁷⁴ 〈蔣先生對當前世局指示要點，五十九年二月三日〉，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蔣先生對本室工作指示，四十二年及五十七年」。

鬥爭中，甚至策動友邦支持「雙重代表權」。⁷⁵筆者不敢妄言台灣曾短暫出現「兩個中國」戰略是受某單一人士左右，但吳俊才所引進的美國學者意見，必然對蔣氏父子有影響。

吳俊才也極力吸收青年才俊。以 1969 年為例，許多年輕博士學者如許偉雲（38 歲）、李鍾桂（31 歲）、丘宏達（33 歲）及王人傑（29 歲）等人，分別以特約、兼任或直接聘用的方式等方式納入「政策研究室」。假如蔣氏父子重視施樂伯的意見，那解釋了為何蔣介石見到吳俊才時特別問道：「你那邊有台灣人嗎？」⁷⁶吳俊才手下的確較多外省人，但也有一些本省人，如上述王人傑即台灣彰化人，後來在政大外交系當國際法教授。也有後來在政壇發展很好的施啓揚博士（副研究員，34 歲）與高銘輝博士（兼任副研究員，38 歲）等。

不過由於這些青年才俊在政、學界都十分搶手，要鞏固研究班底，最基礎的還是自己培養。因此 1960 年代曾對外招考幾次助理員，考試的學歷基礎是大學畢業，吳俊才常親自帶他們做研究。然而，這些助理員流動性也相當高，有的甚至藉出國機會滯外不歸，因此，解決研究人才斷層的方式，就是自己開辦有學位的研究所，故與政大情商，於 1968 年建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背後是國家最高領袖與國家安全局的政大東亞研究所，自然是為國家安全而培養人才，故「不能走一般大學之學術道路，我們要培養品學兼優，且富國家觀念之革命人才」。⁷⁷也因如此，考取的學生除須注重學科分數外，還須通過調查局安全查核。東亞所的位址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在一起，而非位於政大的木柵校園，初於台北市區內的公企中心，後於指南山下授課，充分顯示其特殊性。由吳俊才兼任所長，所安排的授課教授除了一些國內外知名人士，更有

⁷⁵ 有關美台間雙重代表權的演變，請參考 Philip Hsiaopong Liu, "Dual Representation: Review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s Last Battle in the UN," *Issues and Studies* 47:2 (June 2011), pp. 87-118。

⁷⁶ 〈五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國際關係研究所呈國家安全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簽呈蔣先生，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

⁷⁷ 〈趙安國辦公室函吳俊才〉，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藏，《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檔號不詳，「行政雜件，五十三年至六十一年」。已退休的資深國關中心研究員張虎認為，「趙安國辦公室」應為國民黨國安局支部的代稱。

配合蔣氏父子拔擢本土人才的味道。郭冠英的回憶很深刻地描述了當時的東亞所：

政大東亞研究所……它綜合了學術、革命、特務、幹訓等性質。我們像個大家庭，吳俊才是創辦人，是大家長，直通天聽——蔣經國。我們，是培養來研究共產黨的，現在想起來，我們的環境真有點像共產黨……吳俊才那時還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這是一個安全局的附屬機構，可謂「七特三學」〔筆者按：應是七分特務三分學術之意〕，我們這兩個所，相輔相成，位在指南山下的一個山窪裡，人員老師也相交流，還有「安全加給」，因此東亞所學生的公費比山下政大一般研究生要多個 6 百元的樣子……我的論文指導人……國關所副主任郭華倫……原名郭乾輝，筆名陳然，廣東梅縣人，與葉劍英一起參加共產黨，寫了《中共史論》一書。他對我很好，跟我講了一點長征的故事，說胡耀邦是他的傳令，「我騎馬，他跑路。」到草地，最苦的時候，他和葉劍英還得閒在部隊間賽馬為樂。1942 年郭老師做江西省委書記時被捕，「改過自新」做了共產黨的叛徒，國民黨的忠徒……東亞所不但「匪諜就在你身邊」，還就在你頭上，老師都是匪諜共業。其中有一位教農業經濟的，我們最不重視，上課必打瞌睡。本來嘛，共產主義跟種玉米還是小麥有什麼關係？而且老師說的「苟語」我們也不太懂。我們認為這位做政務委員的老師，大概是蔣經國叫吳俊才來養士用的……但這位老師與我們這班倒蠻親，課結束了他還用他那老裕隆，一批批送我們同學到指南宮吃米粉，還叫我們去追他的女兒，完全是日本老師愛護學生的樣子。只可惜我們那時太勢利，眼中只有吳老師，沒把他看在眼裡。⁷⁸

這位教農業經濟的老師即李登輝，且郭冠英可能不知李登輝是在手頭不寬裕的

⁷⁸ 郭冠英，〈那些年研究中共的人——記我的老師吳俊才〉，2012 年 5 月 21 日，《旺 e 報》，<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23874>（2013 年 1 月 7 日檢索）。

情況下愛護學生的。當時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助理員的張虎，其夫人擔任吳俊才先生的助理，她回憶當時李登輝常先拜託她借支兩百元，才能請學生到指南宮吃米粉。

九、改 制

東亞所的學生雖然是培養來當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為「政策研究室」／「國際關係研究所」長期發展所用。然而，會看不起康乃爾大學回來、願以女兒相許又十分疼愛他們的李教授，除了顯示出學生知道國關中心在台灣的特殊地位，也顯示其恃吳俊才而驕的心態。研究生的前途倚賴政府特別機關中的某個人，只會存在於特別的時空。因此若是時空轉移，「政策研究室」或「國際關係研究所」也必須做出調整。

1970 年代初台灣除了失去聯合國席位，最重要的盟友美國也與敵人發表《上海公報》。對台灣而言，武力反攻不再有實質意義，生存成爲主要工作。「國際關係研究所」此刻重要的工作是延攬一批學者如連戰、王作榮、李登輝、郭婉容等籌劃台灣未來外交與經濟；然而從反共抗俄走向鞏固台灣，表示也有更重要的轉型工作即將來臨。

雖然冷戰在 1980 年代末才結束，但對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而言，1970 年代就開始失去「冷戰紅利」。一方面因爲中國大陸逐漸開放，台灣曾經獨享的資訊，國際也開始拿得到。另一方面台灣迅速失去國際承認的同時，「國際關係研究所」也必須進一步褪去官方色彩，否則反而不便他國學界與台灣交流。因此在 1975 年「國際關係研究所」改爲「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惟由於其原來的英文頭銜“*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十分響亮，仍然保留。

「國關中心」的前世因此到 1975 年結束，新生的「國關中心」儼然成爲一個獨立研究機構，僅在名義上隸屬政治大學，與國家安全局也非如局長王永

樹所稱的「一刀兩斷」。⁷⁹雖再無「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國家安全局仍然支持相當的經費，因為「國關中心」在學術上能爭取台灣國際空間，仍有國家安全的價值。惟新時代錄用的人才，已沒有共產黨或諜報人員，除了原本東亞研究所自己培訓學術人才外，爲了滿足國際學界的要求，也錄用了許多留學歐美卻不強調「國家觀念」或「革命」的博士。

待台灣民主化開始之後，學術上國家安全的意義已非一言堂，故國關中心需進一步改制。它和政治大學的互動原本「等於是獨立於學校的關係，除非學校開教務會才會參加」，⁸⁰直到 1996 年國關中心完全納歸政治大學管轄，與政府國家安全機制正式脫鉤，這種曖昧關係才告結束。缺乏政治需要又納入學術體系之後，國關中心難免遭到進一步縮編，幾乎只剩下純學術的功能，走向過去所拒絕的「一般大學之學術道路」。2010 年鄭端耀主任曾簡述跨世紀改制的挑戰：

20 年前來的時候，我們中心大概研究人員就有差不多八九十位，甚至到一百位這麼多，這些都是專職的研究人員。如果再加上行政同仁，整個機構，大約有一百四五十位工作人員……前校長任內，曾進行一次所謂的「震撼治療」，在他那一次整頓的時候，從他當時剛開始任內中心仍有 80 多位的同仁，然後減少了一半……對中心本身而言造〔成〕很大的傷害…政治在轉型，機構必須要轉型，做為一個研究機構必須要生存，那你要生存的話就要靠專業……在目前的結構之下，我們會越來越向學術靠攏……越來越走像〔向〕中研院。⁸¹

⁷⁹ 佚名，〈政要養成所（下）——揭開國關中心的神秘面紗〉，《中外雜誌》，卷 52 期 5，頁 132。

⁸⁰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計畫】對政大東亞所前主任芮和蒸教授的訪問，<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2013 年 6 月 21 日檢索。入徑：→「台港」→「芮和蒸」，下載之附檔，頁 7）。

⁸¹ 吳宗翰，〈台灣智庫機構之分類與發展現況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5 月），頁 315-321、頁 329。

結 論

若單從 1953 年以後的歷史來看，「國關中心」當今的情形無論就人數或影響力，的確有不勝唏噓之慨。但若吾人拉長眼光，王芃生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和日後的「政策研究室」/「國際關係研究所」都是大敵當前下的產物。前者雖然表現優異，也出現許多人才，但未及建立專業形象，人事派系鬥爭未解決，故兔死狗烹，抗戰結束即不再受重視。學術單位與官僚體系都拒收，結果人員落得全遭遣散的命運，只留下王芃生英年早逝與改制困難的遺言。

相比之下，後者在發展過程中雖然受到許多震撼，但終究成為正規體制的一部份。且在精簡之後，仍能聚集許多優秀的當代學者，保留強大的研究與出版能力，未重蹈過去的覆轍，也得以繼續維持其組織價值。回首歷史，兩者命運之所以有很大的不同，最關鍵在於蔣氏父子來台之後權力集中，少了派系爭奪，再憑其父子個人特質，定下專業發展的路線。在專業導向下，台灣除了運用情報人員與共產黨員研究中國大陸，更由吳俊才將這些研究推銷到國際市場，爭取中國問題的詮釋權之外，也拓展情報來源。

因此，敵前養士的實質功能，除了提供領袖謀略，實際上也做到了為國舉才及筆桿抗敵之效，更重要的是為「國關中心」這個組織建立了相當的國際聲望。因此，若僅用「黨營」一詞概括「國關中心」早年的歲月，似嫌簡略。「國關中心」於抗戰歲月中，憑藉其專業能力，為國貢獻良多，這個專業定位與傳統一路延續下來，也確保「國關中心」在台改制之後，即使沒有「黨」的支持，仍然得以持續在學術界綻放光芒。

**Assembling Scholars in the Face of the Enemy:
The Prequel to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7-1975**

Philip Hsiaopong Li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a Kuomintang think ta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sonal contributions of its key staff before its formal establishment in 1975 as part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IIR was constructed from existing intelligence units to deal with a national crisis. In addition to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nd studying the enemy's economy and politics, the organization developed propaganda functions and assembled scholars. Problems with its construction emerged when the national crisis eased.

Keywords: think tan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ng Pengsheng, Chiang Kai-shek, Chiang Ching-kuo

* Graduate Institute of the Americas, Tamkang University